

# 全面绿色转型提速 铺就高质量发展底色

■  
张蔚文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五年。面向“十五五”时期，绿色转型进入系统深化、拓面提质的新阶段。环境约束偏紧的国情没有改变，推进“双碳”目标更具紧迫性与艰巨性。在新征程上逐“绿”前行，仍需多个方面持续发力。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随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更系统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已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与必然要求。这场深刻变革正全面提速，旨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绿色动能，铺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明底色。

## “十四五”时期全面绿色转型 加速推进

“十四五”时期是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五年。在“双碳”目标引领下，从空间布局的统筹优化到产业结构的深刻变革，再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低碳转型，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立柱架梁、纵深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生态基底。

夯实生态基底，统筹“三生”空间布局。空间格局优化是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实现国土空间可持续利用目标的系统性再配置过程，其核心在于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布局。

国家层面，通过深化“多规合一”改革、落实“三区三线”（城镇、农业、生态）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制度安排，实施差异化、精细化环境管理，为发展划定“底线”和“边框”。我国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比超过了30%，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了有效保护。生态共治的区域协同机制也不断完善，全国已建立30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现了区域资源共享与发展共赢。

地方层面，各地结合自身资源禀赋与生态特征，积极探索空间重塑的多样化路径。比如，浙江开化立足钱江源生态本底，构建起科学分区、精准施策的空间管控体系，在空间开发更加集约高效的基础上推进国家公园城市建设；贵州毕节作为典型的岩溶山区，以开发扶贫实现经济建设、生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整合，推动生产、生活空间布局与生态承载力相适应，拓宽“两山”转化的实践路径。

激活发展动能，构建绿色产业体系。锚定“双碳”目标，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减量”与绿色低碳产业发展的“增量”双向互促、协同发展，激活发展动能。

节能减排持续深化，传统产业加速绿色重构。“十四五”以来，截至2025年9月，共有1.98亿吨焦化产能、1.1亿吨水泥熟料产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2000多台燃煤锅炉实施有组织排放改造，能源利用效率持续提升。节能减排的政策推力与市场拉力共同倒逼产业升级，传统制造业在绿色化、智能化转型中实现竞争力重塑，涌现出以浙江永康“五金之都”、汾渭平原低碳乡村等绿色转型为代表的地方实践，产业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持续提升。

与此同时，绿色低碳产业加快成长，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绿色转型的新动能。目前，我国绿色低碳产业规模约11万亿元，新能源、电动汽车、节能环保等产业蓬勃发展。产学研深度融合为新兴产业发展注入持续动力，以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为例，智慧绿洲聚焦“生态+”“绿色+”“智慧+”三大创新领域，已在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生态环境等领域形成集聚效应，为区域绿色产业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力支撑。

数智赋能增效，生产方式创新变革。以数字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推动生产方式创新变革。在绿色技术创新支撑生产端减碳增效的同时，要素创新性配置正推动资源环境要素畅通流动。

在生产端，数智技术成为绿色创新“助推器”。依托大数据分析与前沿信息技术，企业能够精准识别生产流程中的能耗和碳排放，从而实施精细化管控、智能化决策，加速企业侧减碳增效进程。同时，企业间数据资源共享和标准体系共建为协同创新提供支撑，促进绿色创新网络形成，推动产业整体向低碳化、智能化跃升。

数智化推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创新。碳排放权、用水权、排污权等交易正有序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全国碳市场实现全流程数字化监管与精准分析，促进资源要素向绿色领域集聚。截至2025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量6.96亿吨，累计成交额478.26亿元，对实现相关资源环境目标的支撑作用有效增强。

凝聚低碳共识，培育绿色生活方式。需求侧的行为转变为绿色转型提供了另外一种路径方案，通过引导绿色消费、提升公众参与质效，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绿色消费持续释放新活力。在政策引导下，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撬动绿色消费动能，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绿色商圈等绿色消费新场景不断拓展，带动绿色产业链形成良性循环。2024年，中国绿色消费市场规模已达5万亿元，较前一年增长10%，绿色发展理念正转化为社会共识。

公众参与亦成为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力量。机制创新与多元共治推动绿色理念融入集体行动，“河长制”“林长制”等制度创新将生态环境保护从政府单向管理转变为全民共建共享的生态实践，进博会、消博会等大型展会也正积极践行“零碳零塑”与绿色办展理念。此外，各地还通过环境信息公开、碳普惠、绿色积分等机制，构建起覆盖广泛的绿色行动网络。

## “十五五”继续逐“绿”前行

面向“十五五”时期，绿色转型进入系统深化、拓面提质的新阶段。环境约束偏紧的国情没有改变，推进“双碳”目标更具紧迫性与艰巨性。在新征程上逐“绿”前行，仍需多方面持续发力。

推动城镇空间集约化发展。以“双碳”目标为引领，把空间结构调整摆在突出位置，强化空间规划与环境管控衔接，以高质量城市更新推动城市集约内涵发展。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理念，提升空间品质，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

探索产业转型差异化路径。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的基础上，因地制宜确定不同区域绿色转型方向与重点。支持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在前沿科技与新兴产业领域率先突破，引导传统产业节能降碳增效，提高产业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

推进生产技术协同化创新。一方面，加快数字技术在能源领域的创新应用，重塑生产体系，推动跨学科、跨领域融合；另一方面，完善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绿色技术创新机制，形成多元协同、开放共享的创新生态。

倡导生活方式低碳化转变。完善绿色消费激励机制，创造更多符合低碳生活理念的新消费场景和新社交场景。发挥绿色金融工具的引导作用，将碳积分与地方绿色信贷、绿色消费券、供应链招标等机制联动，推动相关产业向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使供需两侧协同发力。

（作者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院长）

# 读懂中国共产党发展规划的时间逻辑

■ 曹东勃 王艺腾

中国共产党将长远与当下统一的智慧，具象化为一套多层次的规划体系，确保其时间智慧能转化为实践效能。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规划中展现的时间智慧，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更显可贵，也为思考大变局下国家发展和全球治理问题提供启示。

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百余年中，中国共产党通过主动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来定义时间，并实践着“将时间转化为人的发展空间”的理念；同时，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最终将时间具象化于一整套兼顾长远与当下的战略规划体系。这种对时间的独到领会，并非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继承，实际上还源于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深切的忧患意识与艰辛的救亡实践，源于对现代化这一历史使命的自觉承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近代以后，中华民族被各种内忧外患耽误的时间太久了，因此中国人民始终有着超乎寻常的紧迫感、时代感。为了实现民族复兴，“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同历史并进”。

由此，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时间的流逝，而是将自身看作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在尊重历史规律之时充分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将时间看作可以通过主动塑造、科学规划的历史过程，既着眼当下又立足长远。这种新型时间哲学承继了中华文化“不谋万世者，不足谋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人们自出而作、日落而息，生产生活是从容舒适的、有韵律节奏的，当然也不免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另一种是在现代化展开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简单线性、无限进步的时间观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形成的深刻动因，植根于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及生活步调加速。在竞争逻辑推动下，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剩余产品持续增长。人类被裹挟进一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社会亦进入到一个“强制进步”的全新节奏，当然也不免在时间的“加速”中本末倒置、“见物不见人”。自此，人类的时间体验也被资本与技术全面重塑。

马克思有言：“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马克思主张将时间作为人拓展自身、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空间，这对中国共产党人启发甚深。在领导中

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持续上百年的判断，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长期谋划，以及“分步走”的战略蓝图。这就要求准确判断内外部形势，确定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解决国家发展大方向的问题。它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保持历史耐心的基本基调，也是所有规划的总依据。由此，我们主张“一张蓝图绘到底”，倡导“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与“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甘于投身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业。

其次，发挥衔接作用的是发展规划层，即把上述“分步走”的步骤以五年为间隔来制定五年规划，后者也成为治国理政框架中打通远景目标与年度任务的重要枢纽。这一枢纽组与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党代会，一同形成政治定向与政策执行有序协同的一体化设计。这种设计本身也从制度安排上决定了“一茬接着一茬干”，并能够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灵活调整重点工作任务。此外，中央和地方层面还构建覆盖多个领域的规划体系，比如《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等，形成共促改革攻坚的强大合力。

最后，是抓落实的执行操作层，这主要是通过每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来确定政策基调，并通过来年的两会，依托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过去一年工作成就和不足的基础上，部署当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要求、政策取向及工作任务。由此，社会发展蓝图被分解为具体的年度工作任务，确保狠抓落实、久久为功。

上述三层规划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以细节决定成败的韧性和耐性勾勒出逼近圆满的宏伟蓝图的时间治理实践。它既兼顾了“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又辅之以机动调整政策方针的战略灵活性，构成了稳定而高效的实践框架。

## 时间智慧的当代价值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规划中展现的时间智慧，在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更显可贵，也为思考大变局下国家发展和全球治理问题提供启示。

一方面，这种智慧体现了长期主义的发展原则，是对现代社会弊病的有力回应。受工具理性和市场思维的影响，现代社会存在突出的“即时满足”或“短期偏好”现象，个人、企业甚至政府在功绩或效益的驱动下，会不同程度地过于关注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这种现象在数字化生存下更是被技术逻辑空前地放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通过制度化的长远谋划，确保国家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沿着既定目标勇毅前行，防止出现方向性、颠覆性错误。从摆脱贫穷到全面小康，再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都体现了这种远见。

另一方面，这种实践智慧为世界提供了应对发展难题的中国方案。“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中国将现代化这个宏大工程不断从宏观到微观进行细化、精准化的、具体而微的目标任务分解，实际上也呼应了马克思所指出的，“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中国在发展规划推动下，使既定目标实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逐步收敛为零，社会不断进行量的积累、实现质的跃升，整个现代化进程展现出阶梯式递进、波浪式前行的图景。即便针对国际问题，中国致力于促进人类和平发展与长期繁荣进步，也贯穿立足长远、持之以恒的战略思路。这种兼顾长远与当下、理想与现实的中道智慧，为世界各国思考如何驾驭改革发展问题，以及应对全球挑战提供了可行方案。

（作者曹东勃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首席专家、教授，王艺腾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新中国第一场与国同频的大规模青年动员

■ 胡献忠 梁秋水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之际，重新审视当时卓有成效的大规模青年动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它不仅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障，更为此后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奠定了组织化的实践范本。

▶ 10月25日，辽宁丹东鸭绿江断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向志愿军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



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最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是维护新中国国际地位和民族尊严的必然之举。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政治远见与组织能力，充分调动各种资源，通过宣传教育、思想引导、行为发动、组织保障等的系统动员，有效激发了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与斗争精神，形成了空前团结一致的局面。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5周年之际，重新审视当时卓有成效的大规模青年动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经过这类系统而深刻的思想动员，广大青年深化了对战争局势、国家安全、民族尊严等的正确认知，“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的观念由此深入人心，实现了从情感共鸣到政治认同的理性飞跃。

## 思想动员：从情感共鸣到政治认同的理性飞跃

抗美援朝时期的宣传动员多管齐下，文字刊物、座谈会、广播、文化文艺活动等多种形式相互配合，使宣传动员渗透到青年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各个环节。

文字刊物是抗美援朝时期宣传动员的基础渠道。《人民日报》从1950年到1953年频繁刊发社论、评论员文章、战况简报，创设“抗美援朝专刊”并配发漫画、短评，针对青年中存在的复杂情绪进行舆论引导。宣传抗美援朝的半月刊《时事手册》的发行量，从创刊号的10万余册迅速增加到第三期的60余万册。这些读物广泛流通，成为青年获取时事信息和学习材料的重要来源。

广播的运用弥补了纸质媒介与面对宣传在效率上的局限，被誉为“对人民群众进行大规模动员的有效方法”。这一时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美国真相》《美国侵华史》等专题节目，增强了青年的信心。各地广播电台也配合播放抗美援朝讲座、讨论和问答节目。吉林、江苏、浙江、福建和北京、天津、武汉、沈阳、西安、重庆、广州等4省7市，仅

报名总数的1/8。1951年6月，第二次招收通知见报后，短短几天，广州就有8500多人报名投考，其中学生6000多人，社会青年2400多人。

捐款捐物是广大青年参与抗美援朝的又一重要形式。1951年6月，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开展捐献武器运动号召，各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街道以及人民团体和工商业者同业公会等组织，大范围制定捐献计划。广大青少年参加了“中国青年号”“中国学生号”“中国儿童号”飞机的爱国捐献活动。青年豫剧演员常香玉带领剧社半年内巡回6个省份，演出170多场，用义演收入捐献了1架“香玉剧社号”战斗机。杭州中等以上学校捐款2亿多元（旧币），捐书刊2000多册，给志愿军慰问信4000多封……

通过这些环环相扣的行动，广大中国青年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到国家事务中，不仅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坚实的人力与物质保障，也将党的政治号召转化为一代青年真切的生命实践。

## 组织动员：推动分散个体整合为有机集体的重要牵引

组织动员是所有动员的重要基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组织动员的根本保证。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完成了对全国政权的接管，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体系。各级党组织、行政机构、工会组织、青年团组织的领导统一与步调一致，是做好动员工作和顺利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一个必要条件。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发出，全国各地随即以党组织、青年团、工会、妇联、学联等为抓手，形成覆盖城乡的动员网络，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承担骨干作用，农村青年踊跃支前。

这一时期的亲民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在抗美援朝的组织动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要求团员带头报名参军，还帮助普通青年解决思想顾虑并推动其态度转变。由此，青年团的威信显著提高，团员政治意识和组织纪律性得到加强，青年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进一步扩大。抗美援朝运动对青年政治认同和组织认同起到了双重的塑造作用。

抗美援朝时期的青年动员，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战时应急举措，演变为一场通过系统组织塑造新人、建构认同的深刻社会变革。它所形成的集宣传、思想、行动、组织于一体的全方位动员模式，不仅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保障，更为此后中国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奠定了组织化的实践范本。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引导青年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作者胡献忠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共党史与青年史系教授，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馆长；梁秋水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专业硕士）